

# 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结构话语

刘占虎

**摘要:**现代化是从传统农牧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构变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指向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客观上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视野进行前提审思并予以历史逻辑的比较分析。在外源式历史境遇中开启自主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必然蕴含特定的政治逻辑和结构话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志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是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以百余年进程观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是基于特定结构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实践创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形态,其主题和前提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从思想发展形态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形态上呈现特定的思想逻辑、价值主张、中国话语等结构要素,在实践形态上彰显特定的历史逻辑、时代坐标、中国特色等时空要素。这一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逻辑表达,也是以“中国式”的政治逻辑重撰人类现代学的思想坐标。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结构内涵;话语形态

DOI:10.26933/j.cnki.12-1465/a.2026.01.006

在外源式历史境遇中开启自主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尤其是在“古今中西”的时空境遇中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蕴含特定的政治逻辑和结构话语。如果说“现代化的共同方向是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走向创新和无休止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经济生产和分配从家庭与社区中分离出来,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和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sup>①</sup>,那么,从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虽然并不完全是现代政党导致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诞生,但是现代国家诞生之后所孕育出来的政党,却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决定力量”<sup>②</sup>。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古今中西”高度聚合的时代场域,通过比较诸种现代化方案,在反复实践中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实现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本质、原则、特质,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③</sup>就其内涵特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内涵结构,需要一种“朝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化思想演变逻辑和发展形态研究”(项目号:22BKS06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占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① 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5页。

②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7页。

向事情本身”的语境逻辑。因为“一定语境的次序就决定了概念的性质,而不是脱离了语境来抽象地分析某个词。我们不能脱离语境来分析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得出个结论”<sup>①</sup>。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创生的语境逻辑,首先要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结构”和“主导逻辑”<sup>②</sup>,并由此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形态上呈现特定的思想逻辑、价值主张、中国话语等结构要素,在实践形态上彰显特定的历史逻辑、时代坐标、中国特质等时空要素。为此,从“现代学”基础理论和总体性视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逻辑”<sup>③</sup>和发展形态,需要从其生成逻辑和结构话语来具体切入。

## 一、思想结构:原生理论与中国逻辑的时空统一

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历史逻辑所演绎的制度变迁方式。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抽象概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简单叠加”,而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大致经历四个历史阶段:一是西欧资本主义初步确立和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从“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后期),二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世界体系的形成(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参与的全球化进程(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四是社会主义重塑世界现代化的多元发展道路(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是在第三个阶段以外源性方式和被动姿态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在第四个阶段以自主姿态探索现代化道路并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是影响和主导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重要前置命题。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基于特定时代诉求而创生并不断发展的。相对于各种发展形态而言,一般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视为原生理论形态。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世界”之“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从科学到实践的多元发展必然呈现地域化的时空特色,地域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多元发展,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时代化出场。从出场学的视野看,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是“一”与“多”、“源”与“流”的内生(派生)关系,体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逻辑。在“现代学”的知识框架中,马克思被西方学者视为“现代性”谱系中的一员,比较而言,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向的审思是全局性和总体性的。之于东方社会形态历史性变迁的分析中,马克思曾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将会产生“中国社会主义”,同时明确强调,“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sup>④</sup>,必然内蕴特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作为“一”和“源”的“社会主义”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各种发展学说之守正创新的思想前提。从内源性本质来看,作为“多”和“流”的次生形态在思想前提和制度逻辑上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内在规定,也是后现代化国家以不同方式走向现代化的世界视野和必然选择。

科学理论的出场不仅呈现为思想形态的成熟,更体现为思想以“革命的实践”之力量引领时代的实践智慧。恩格斯明确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

① 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5页。

② 刘占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逻辑》,《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0期。

③ 刘占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创生逻辑——“现代学”的中国叙事和文明进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上。”<sup>①</sup>科学社会主义正是通过“现实的基础”这一中介走向不同次生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化出场,是综合国际形势、地域国情、时代主题而形成的差异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作为“如何做”的实践模式是支撑科学理论通向具体实践的“中介环节”。作为民族国家之于具体场域(特定历史条件)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同样包含道路选择、价值定位、制度逻辑、实践机制、效能优化等要素。有了这一“中介环节”,既可以借助时代化的实践课题去把握原生理论的内在逻辑和意义向度,又可以原生理论的内在规定来调适诸种次生形态的实践向度。

实践模式是特定思想逻辑的对象化方式。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是朝向具体问题的,需要总体考量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约束条件。当分析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时,我们既要看到它本身的特殊性,也要看到它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共通性(普遍性)。如此,在“理论联系实践”与“实践观照理论”的交互发展中,重在以出场形态的多样性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和意义指向。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具体分析。

一是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言,不同社会形态的现代化实践模式尽管存在制度属性的差别,但在实践模式上有一定的共通性(普遍性)。现代化进程意味着相互联系的变迁的总和,人类创造历史总是在既有文明成果基础上展开创造性实践。如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是整合和优化生产力要素的重要方式,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在制度逻辑和价值定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运用和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旨在创造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契约精神等作为具体化的实践模式,可以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要素。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作为高级制度文明形态,必然要吸收人类文明进程中创造的所有积极成果,将此作为支撑社会发展和文明进阶的重要基础。

二是就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言,不同民族国家尽管在制度属性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基于条件约束体现在具体实践机制上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诚如“认识现代化所固有的全球化特征并不意味着采纳欧洲式的方式,乃至也不意味着建议过渡到现代性的唯一蓝图。相反,它意味着认识到进程的单一性以及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的独特性。”<sup>②</sup>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是现代化之中国道路的思想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地域性的实践模式,尽管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基于国情和时代境遇的差异而呈现出地域特色。一般而言,作为在同一制度语境下的比较,意在分析科学理论的出场逻辑以及地域化的实践特色,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有益参照。这一维度的比较不应过于强调不同发展模式的“质性差异”,而应着力分析现代化道路的出场条件的差异性和质的共同性,即在可对话和可比较意义上探索“共同但有差别”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三是就不同社会制度形态的实践模式而言,需要明确比较的制度前提或限定条件。如民主作为人类共有的核心价值,是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进行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重要原则。然而,作为民主的具体实践模式,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的产物,故而不能忽视或遮蔽作为其前置条件的制度逻辑。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即作为高级形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通过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来实现的。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逻辑的制度和利益化表达,是通过三权分立、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来实现的,旨在维护特定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在一些意识形态话语中,经常将当代中国的制度逻辑与“西方模式”进行比较,或以西方之“长”来比中国之“短”,或以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之得失。吊诡之处,在于其有意遮蔽社会主义这一制度逻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② 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

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sup>①</sup>比较固然要考量差异性和共同性,但完全一样或完全相异的事物均不能比较。这就意味着,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结构必须明确其前提条件及内在规定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化出场。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sup>②</sup>,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踏上新的征程。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主要是在比较学习中探索“走中国自己的道路”<sup>③</sup>。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sup>④</sup>。在这一基础上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从理论发展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社会基础上开创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由此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离开原生理论的思想结构,就难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和政治逻辑,也难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现代化的重要结晶是思想形态。科学理论以揭示世界规律为要旨,应时代潮流而生,随时代主题而新,由此作为对“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sup>⑤</sup>。当代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源自科学理论的指引和时代化的辩证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这一辩证实践的理论成果和发展形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持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与全面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以贯之、有机相承,不仅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价值主张,也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古今中西”高度聚合的时代场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实现了原生理论形态与中国时代场域的时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发展实际的辩证统一,在思想资源的“综合集成”中确证人类以何种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主题。这一主题从内在规定性上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特质,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是在共时性维度上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且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核心是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定赋予人类现代化以新的理论内涵。二是在历时性维度上遵循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和中国发展实际并呈现显著的中国特色,核心是以“中国式”的实践内涵和地方性知识赋予人类现代化以新的实践内涵。

## 二、主体结构:先进政党与人民主体的内在统一

人类历史实践表明:现代化呈现诸多面相和特征,但在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正如人是社会历史创生的主体一般,但在现代性的叙事中,之于主体的价值定位和逻辑预设是存在制度差异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34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换言之,相对于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物”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现代化”,即将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成果聚焦人的全面发展本身。一般而言,现代化是现代性的生成过程,现代性意味着稳定和确定性,而现代化则充满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不确定性。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出场,还是由此展开的实践模式,都有一个支撑“革命的实践”<sup>①</sup>的特定主体结构,即“谁在做”与“为谁做”的辩证结构。人类现代化进程必须有一个引领时代进步的领导力量和致力于多数人发展权益的价值坐标。如果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②</sup>,那么,现代化作为文明进阶必然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实现自我解放的历史叙事。以发展性思维说明这一辩证结构中的主体关系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之主体结构的思想前提。

主体结构叙事决定价值定位,价值定位决定发展目标。过往的历史叙事,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掩盖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性。比较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朴素的民本思想,体现治国兴邦的政道追求,但不可因此遮蔽由“民本”与“君主”之相斥要素构成的“阴阳组合结构”<sup>③</sup>。其中,“民为邦本”是“君为国主”的附属元素,民本以君主为核心并服务于君主专制本身,在事实上并没有将创造历史的主体与共享社会福祉的主体统一起来。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及开启现代国家建构范式的人民主权说,同样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个人权利本位抑或资本权力的“政治化表达”,在主体结构上服务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逻辑。也就是说,理解政治叙事中的主体结构,“不能从政治形式本身去寻求政治形式的本质,而应从决定政治形式特定功能的特定的统治内容,去揭示政治形式本质”<sup>④</sup>。以上两种制度形态在主体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的“质”,就是没有“在现实性上”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没有将广大创造社会财富并推动历史进步的“劳动者”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社会发展的归宿。在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中,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以先进性和彻底性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主体赋予人民群众‘主人’的地位,领导核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地位”<sup>⑤</sup>,从内在统一性上构成“谁在做”与“为谁做”的新型主体结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统一。基于这一主体结构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前提上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潜在的意义困境、发展滞胀、生态危机、霸权逻辑,并在结构革新中形成以先进领导力量为保障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在价值逻辑上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事业,无产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物质承担者。在这一主体结构中,科学社会主义是广大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工人运动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历史科学”。在实践逻辑上,只有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解放全人类,易言之,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是以人类解放为前提的,在主体逻辑的一致性上表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彻底性。一是就先进性而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就彻底性而言,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⑥</sup>。同样,中国共产党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③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④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4页。

⑤ 辛鸣:《中国制度的实践辩证法》,《哲学研究》2020年第10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sup>①</sup>。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型主体结构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sup>②</sup>,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本质要求。这一主体定位决定无产阶级政党是为人类求解放和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型政党,超越了以往社会形态之主体结构叙事的两面性和虚伪性。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即在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场逻辑而言,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事业一定是“世界性的”——以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为基本前提,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可以是“地域性的”。在“世界历史”生成境遇中,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既秉持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也肩负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特定使命。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回顾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时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sup>③</sup>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之“组织联合和行动联系”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作为其显著的政党意志和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sup>④</sup>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初心、使命是一以贯之的政党本色,体现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统一性。一言以蔽之,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党的一切工作都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逻辑集中表达“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坐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情怀,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繁荣发展。这一价值定位构成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实现人类进步事业的道义制高点。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以斗争和革命精神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从来不缺乏对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设想,然而,将理想和设想变成现实者鲜见。美好生活要依靠特定主体的艰辛奋斗来实现。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sup>⑤</sup>。社会主义革命充满坎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然。这就意味着只有具有斗争和革命精神的使命型政党才能领导人民破解诸多发展性时代难题。现实地看,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和“调味单”,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遵循人类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开拓创新。直面在“古今中西”场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矛盾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基点和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斗争和革命精神来不断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发展地看,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有机体,既表现为多重矛盾的聚合体,也呈现为矛盾运行之过程的结晶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sup>⑥</sup>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即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之“需要结构”的新内容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定位。新时代把握时代主题和破解社会主要矛盾,一是需要以新发展理念统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以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从总体性上化解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二是需要继续发扬斗争和革命精神,以改革和发展的方式破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诸多难题,以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申而论之,审思和破解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困境,需要借助科学世界观(作为人类解放学的“历史科学”)的总体性视野。和平性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质,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代世界存在“两制并存”的客观局面,“两制并存”不等于“两制平行”,这就意味着两种制度之争的意识形态较量仍将长期存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自主发展和和平发展的“外部性风险”一直存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化境遇中,有效破解时代发展之困局和中国发展之难题,客观上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引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主题。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实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作为这一历史逻辑的主体结构,体现为坚持使命型政党与人民性立场的价值统一,通过作为核心领导力量之“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sup>①</sup>来保障并探索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奋斗主题,到实现人民幸福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正是基于使命型政党与人民性立场的价值统一,在生成结构上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逻辑和政治逻辑。

### 三、制度结构：宏观架构与动态机制的综合集成

人类现代化作为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总体性的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理念、规则、治理的系统化变革。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具有超越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制度优越性和时代创造性。在“古今中西”之复杂场域中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现代化,作为修饰语的“中国式”不是一种抽象的话语修辞,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内涵指向,即以人类文明进阶的未来视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发展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在实践逻辑上恪守人民立场和中国本位,并通过特定的制度结构来表征和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既从历时性维度展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代巨变,又从未来学视界布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之治”的生动政治表达,在制度结构上表现为宏观架构与动态机制的“综合集成”。

其一,从宏观架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辩证统一。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其规定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表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向,二是表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定位。就发展方向而言,道路选择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遵循,人类历史总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演进的,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方式不是“定于一尊”的单选题。“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sup>②</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其他现代化道路或模式的扬弃,即表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6页。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23页。

帜的邪路。就发展定位而言,一是立足中国场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中国国情的特点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约束和条件制约;三是处在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现发展社会主义的世界场域和参照对象。由此,从“否定性”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历史文化母版的简单延续,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模板的简单套用,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从“肯定性”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实践和发展形态,因而蕴含特定的“制度—文化逻辑”<sup>①</sup>。

其二,从横向布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实现。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理解主要限于器物、制度、文化层面,以师夷长技、师夷制度、师夷文化为主要取向。百余年来,历史实践表明,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众多支撑性要素统一于人的现代化。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总体视界看,人类现代化既取决于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更取决于人类文明进步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发展取向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致力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sup>②</sup>,丰富和拓展了人类对现代化的本质性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结构优化。总体布局是贯通“总依据”与“总任务”的实践环节。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重点领域的深化发展转向新时代统筹推进的总体布局。从现代化的条件和场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世界现代化的规律约束,也有来自逆全球化和外部条件的诸多挑战。人类现代化历史表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现代化潮流不可阻挡。不同于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从中国看世界”和“从世界看中国”的双向视野来审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位,始终坚守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方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主动谋求自身发展。二是坚持开放发展,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两个大局”布展新发展格局,在发展好自身的同时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历史地看,人类现代化进程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殖民扩张侵略是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特征。亦如“现代化转换和改变了各个地方社会的现实,其间存在大量的抵制和尖锐的冲突。”<sup>③</sup>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样充满诸多外部性风险和结构性挑战。当代中国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视野布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由此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综合集成”,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集成性”的发展动能。

其三,从动态机制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和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全面布局和动态优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着眼执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时代问题,从战略高度作出总体判断和筹划。如果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这些核心内容的动态机制。

① 刘占虎:《总体秩序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文化逻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8页。

③ 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页。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纵深推进,党的十九大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战略安排,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通过两个“十五年”的阶段性目标逐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全方位的谋划和部署,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以贯之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之动态结构的战略部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可持续的发展势能。就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为出发点,以历史主动精神遵循“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构起“长远目标—中期规划—年度计划”的战略实施体系。其核心是以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来整合多元主体和发展资源,以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调适并优化阶段性发展目标,形成“综合集成”的治理合力和发展动能。由此表明,科学制定和动态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政治定力。

由上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在宏观架构、横向布局、动态机制上形成了具有结构性张力的中国方案,以破解现代化困局的“中国之治”呈现出可持续发展之总体性的制度结构。从生成和发展逻辑上看,贯穿宏观架构、总体布局、战略目标的主线,就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sup>①</sup>,由此以“中国之治”为保障来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战略目标。

#### 四、发展结构:物的丰富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合题

如前所述,现代化作为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和方向定位。几百年来,世界现代化带给人类的福祉是显著的,而潜在的危机和困局也是空前的。人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遇中又一次站在了文明选择的“十字路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主导的现代化叙事,将地域性实践的“特殊性”上升为超时空之“普适性”的霸权意志,不仅阻滞“西方之困”的救赎之路,也由此遮蔽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结构。

在比较中西方现代化道路时,人们往往持以“两制并存”等于“两制平行”的认知思维,将“现代化”嵌入“西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由此遮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逻辑和方向定位。事实上,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逻辑导向的现代化是不属于同一序列和发展位阶的话语叙事。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呈现出“中国式”的显著特质,即在发展形态之方向结构上是实现“物”的解放(全面丰富)与“人”的解放(全面发展)的辩证合题,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叙事”的历时性解答和中国化确证。

物的解放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②</sup>这是肯定资产阶级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性贡献。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的关系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sup>①</sup>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呈现出逆向发展的关系,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由此导致“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sup>②</sup>。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容纳不了其本身创造的财富,使“社会上的文明过度”在“相反形成”的意义上消弭或遮蔽人的发展。“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sup>③</sup>这就意味着,在“剥夺剥夺者”的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④</sup>。基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的物化原则,在更高级的发展形态之“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将资本上升为“独立性和个性”的支配性逻辑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立性和个性”<sup>⑤</sup>。现代性叙事之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最终指向人的现代化。同样,物的全面丰富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是走向“人的复归”即“人的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现代化道路探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同样需要从这一坐标来总体审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作为常规主要分析范式的“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向度与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在“辩证合题”意义上阐述的。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构成的有机系统,意味着首先要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来对待,其次要把社会发展作为统一的历史“进程”来把握。对事物本身的过程考察,是把握事物本质及其内涵拓新的思想路径,因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sup>⑥</sup>。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是基于全球化场域和时代化实践生成其实质性内涵,因而是一个原创的且具有标志性的概念范畴。于此,整体理解和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结构,需要以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坐标来审视。

为此,不妨回到经典文本的语境予以分析。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意义上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sup>⑦</sup>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进一步概述为“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sup>⑧</sup>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作为苏联教科书的主导性观点,其一度成为影响广泛的论见。出于理解上的方便,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进程简约为“固化的线性”逻辑,由此也引发了不必要的曲解或误解。此外,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即作为主体社会维度的“三形态说”<sup>⑨</sup>。比较而言,“三形态说”着眼人的发展状况,即从经济交换关系的维度来对应人类社会中的自给经济、市场经济、直接社会化经济,由此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趋势的科学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2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⑧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然史的过程。”<sup>①</sup>这里的“自然史的过程”(同自然的历史相似),不应仅仅理解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纯粹的自然的客观过程,其中并不遮蔽或否定人类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地位及其能动作用。“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sup>②</sup>。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总体分析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约束和条件制约,进而由此阐明运用这一“历史科学”来指引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词是“社会主义”,表明坚持“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定位。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条件的,这是因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sup>③</sup>。社会主义是全面占有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高级制度形态。物质财富的丰裕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要素,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经典论述”<sup>④</sup>,正是通过联系“生产关系”并从“生产力”维度来揭示的——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要素,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质,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定位。就发展生产力的价值定位而言,“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sup>⑤</sup>,本质上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来追求片面的财富增殖,旨在满足资本利润的无限增长和少数人的发展利益。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社会为本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主体结构上革新了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资本至上或物化逻辑,将作为“社会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发展权益置于超越“物的依赖性”之上,以社会主义制度逻辑来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和潜在的物役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意在将“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逻辑,由此作为方向统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限定词是“中国式”,表明人类现代化理论逻辑在中国场域的生成逻辑和实践特质。现代化是历时性的变革进程,呈现为共时性的时空特征和地域性的实践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外源性”语境中开启自主探索的,具有“并联式”和“综合集成”的显著特点。于此,作为限定词的“中国式”不是一个简单的修饰语,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一是就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而言,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运用市场经济来优化和配置资源要素,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说,“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sup>⑥</sup>。二是就现代化的基本国情而言,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具有显著的中国特点。这一特点既是中国探索现代化的现实基点,也是中国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比较优势,进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三是就现代化的价值定位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同时强调作为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根本立场,即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发展的战略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高质量发展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一意义上的“中国式”集中表达中国的国情实际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由此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4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18页。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与“中国逻辑”的辩证合题,是创造人类文明未来形态的中国方案。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历史”是一个历史哲学意义的范畴,意在从方法论层面揭示人类世界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历史逻辑上指明人类文明进步的坐标。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实际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性决定的。百余年来,从“外源性”和“被动式”的现代化探索逐步走向“内生性”和“自主性”的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特质和出场逻辑。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积极吸收人类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体现了对既有现代化模式之“母版”“模板”“翻版”的内在革新。就文明形态的内在规定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导向的现代化的内在超越。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先进性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统一起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之治”代替和超越“西方之乱”,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向度。二是以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规避资本无限增殖带来物欲的无限放大和物质主义的膨胀,使“物”的文明的现代化要素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集中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三是以马克思“历史科学”引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物质变换”的有机性呈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于“和谐共生”的包容性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基于上述思想特质,中国式现代化以“世界历史”的未来向度彰显人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为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切实解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贡献了彰显人类文明进阶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思维领域形而上的纯粹哲学命题,而是遵循特定历史逻辑并在“革命性实践”中走出来的现代化新道路,本质上是对中国发展逻辑之“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思想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新而开放的事业,对于认知中的诸多迷思抑或意识形态偏见,“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sup>①</sup>。以人类文明进阶视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结构话语形态,正是以“真理的此岸性”抵达对“现代性迷思”的真理性澄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充分彰显人类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物本走向人本,从外源走向内生的总体性解放叙事。“现代学”叙事始终不能绕开“人类解放”叙事的总体坐标,破解“现代性迷思”的历史主动,正是从结构话语形态入手而展开的思想澄明和创造性实践。在“重撰”人类现代性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为“尚未完成”的现代性事业赋予其实质性的文明内涵,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思想形态成为彰显“真理性”的人类现代化新道路。

【责任编辑:王利娟】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